

于光远

经济论著全集

第5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于光远

经济论著全集

第5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 第5卷/于光远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30-3524-8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8174 号

内容提要

《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收录了于光远先生有关阐述经济问题的专著、文章等, 并按主题与时间顺序分卷出版, 将于光远的经济思想理论完整而系统地展现给广大读者。本卷收录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四)》, 收集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 19 篇文章。向大家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 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探索轨迹。

项目负责: 蔡 虹

本卷责编: 兰 涛

丛书责编: 国晓健 蔡 虹

责任出版: 卢运霞

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 (第5卷)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14

责编邮箱: lantao@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4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ISBN 978-7-5130-3524-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说明

一、《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收录了于光远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专著、文集、文章、发言（有文字记录者）、信件等。

二、《全集》采取以著作、文集为基本单元的编辑方针，即：

- （1）专著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收入《全集》；
- （2）文章分别编入曾汇集出版的文集，以文集为单位收入《全集》。

三、凡逢一篇文章曾编入不同文集的情况，则以文集主题相对狭窄者优先。例如，若一篇文章曾收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和《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则将其收入《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编入《全集》，而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剔除。

四、原出版的文集中如果包含经济论著和非经济论著，则将非经济论著剔除，留下经济论著，并保留原出版文集名称。

五、《全集》各卷遵循以著作、文集首次出版时间为基础、略加调整的原则排序。调整的情况包括：

- （1）当文集为系列文集时，以第一辑出版时间加入《全集》各卷排序，此后各辑紧接其后；
- （2）一部著作在首次出版后又经较大修改重新出版，则将后者放在首次发表的著作之后，编入《全集》中的同一卷；
- （3）当若干部文集内容相关性较高，首次出版时间相近时，根据《全集》编辑出版时的分卷规模，有时将其收入一卷。

编者 刘世定 胡冀燕 于小东

目 录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四)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	3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任务	26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方法	4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中讲得不充分的新观点	59
以价格问题为例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73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93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	110
计划经济与计划规律	129
把价格放在前面, 把价值放在后面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方法论上的一个现实的考虑	151
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166
访问联邦德国和瑞士时所做的十五个报告	175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175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18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所有制形式的选择	184
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	186
中国经济改革——过去的八年和今后的若干年: 我对这的观察和思考	188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力下放	190
中国城市中的经济改革和物价问题	19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195
企业和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新作用 (提纲)	199
社会主义体制和世界和平	200
中国的改革政策	203
中国改革的长期计划和执行中可预见的问题	206
条条社会主义道路通共产主义	209

“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成立	212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215
访问联邦德国和瑞士期间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思考	234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发展	25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261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关系	296
谈谈经济规律体系的研究	310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实物和货币	314
关于社会主义地租的若干问题	32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366

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

内容提要

（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

（二）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中共产主义不只是因素。这个历史阶段既然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个阶段中就应该处于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是这一阶段生产关系的基础。

（三）关键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中生产关系基础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是什么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对共产主义这一名词做出科学的分析，指出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和实际生活中，人们用共产主义这同一个名词所表示的不是一个概念。必须经过分析把共产主义一词的各种含义讲清楚，才能避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由此而来的对实际工作的不良影响，从而改变现在对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流行的、笼统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说得重一点也就是不科学的）观点。

（四）应该把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分作：

共产主义 A。它是原始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后出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共同的东西。

共产主义 B。它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共同的东西。

共产主义 C。它是共产主义高度发展后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五）共产主义 A、B、C，都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抽象。它们有历史的内容，但又不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的阶段。

原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的阶段，而且它们的存在已经是历史事实。自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世界上已经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分。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也在世界上成为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发展也大都如此。这样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只能是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

共产主义C指的是高度发展的、具备纯粹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具体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经历极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它在漫长的发展中会经历许多具体阶段。这些具体阶段会有它们自己的具体的质的规定性。以共产主义C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

（六）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是由共产主义B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东西结合而成的一种生产关系。共产主义B区别于共产主义A，我称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B中，生产资料为社会共同所有。这里说的“社会”是现代民族规模或多民族地区规模的社会，是分工发达并且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因此在共产主义B中不能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后一个否定不是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而是上升到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

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应该说不准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只是为了适应流行的语言，即“通常”的说法。他不但没有论证，连说明的话也没有。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东西，是由于这个社会刚刚从旧社会产生，因而不可能不带有这个新社会由以产生的那个旧社会的某些母斑。具体说来，就是实行按劳分配和存在商品关系。这种商品关系与私有制下的商品关系有原则上的区别。其中，按劳分配是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早已肯定了的，而存在商品关系则是经过近几十年的讨论逐渐明确得出的结论。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特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为了适应“通常”的，即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语言，在这里还用“社会主义”来表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

（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任务、方法，就是由它的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决定的。

（八）中国现正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见十一届六中

全会的决议)。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不仅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为对象。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特征是什么?需要明确。比较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更强的物质刺激的必要?管理工作中官僚主义的存在与反官僚主义的必要?不但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的外国资本主义而且允许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存?

(九)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能孤立地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它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关系。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与外国,甚至本国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也增加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从这次起,我想在每两个月一次的“经济学活动周”期间,连续讲若干次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想法。每两个月讲一次,每次讲两三个小时,讲完之后,同志们讨论,由同志们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然后我再做一些回答。

这个讲座,一共讲多少次,现在还不好定,估计一年是讲不完的,当然也不可能讲很久。一则我没有这么多的话好讲,二则我也不想讲得太久。

这个讲座,大体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任务、方法和这门科学的性质的看法;第二部分讲讲这门科学的若干规律和范畴。讲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主张。这个讲座可以有一点系统,但是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系统,带有松散的性质。我觉得这样讲更随便些、自由些。

我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历

这虽然是题外的话,但是同我想做的这一系列演讲是有关的,而且我也愿意告诉同志们我在这方面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写了几本通俗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这些书都没有什么创见。我的兴趣不在做这样的事,而想做一点研究工作。我最早安排的计划是写一部关于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家知道考茨基写过一部《土地问题》,这

本书曾经受到列宁的赞扬。我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我国土地问题发生了兴趣，以后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也很有兴趣。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陕甘宁边区研究土地问题，我们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的运动我都参加了。我在陕甘宁、晋绥、山东等地区都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注意做系统的调查和思考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我认为总结我国土地改革的经验，写出一本理论性较强的著作还是有可能的。自己于是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这个工作进行不久，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使我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我看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件事比起写土地问题的书来要重要得多。那时我以为将要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是一本水平很高的书，可是1954年看到这本书之后非常失望，于是就有自己动手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党组织的支持，于是在1956年就组织起一个班子，着手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个工作在当时是作为党的一个任务安排的，因而能从全国许多高等院校调集教师参加。

在着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说不知深浅，甚至以为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把这部书写出来，可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到有问题，感到写这样一部书很困难，不进行大量的研究就无从下笔，于是就组织大家讨论和研究。可是正当我们很热烈地就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教科书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编写组的同志在讨论中发表的言论有的也被作为右倾甚至右派言论来批判。于是这个工作就中断了。

但是在1956年和1957年，我还是写了十多篇论文在刊物上发表。1958年上半年我还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一个集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由《学习》杂志社出版。在这个集子的《后记》里，我写道，当今的时代“不仅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更有必要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建立起来”。在这篇《后记》中，我一方面肯定苏联、我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这门科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最后解决”“还在探索着前进”。在我写这个《后记》的时候，我只考虑这个学科的状况，自己怎么看就怎么写，没有想到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在“反右补课”中被批判为口气太大，属于狂妄的性质。

我没有接受这样的“批判”，因为我并不认为我能轻而易举地建立这门科学，我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探索者”而已。在这30年中我一直在探索。1958年出了那个比较薄的本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后我

仍用这个书名，出了两卷比较厚的书，现在第三卷也已经编好，开始考虑编第四卷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我终生都会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有客观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当然是我的能力差，没有能力驾驭这样大的研究课题。

反右结束后，1959年党中央理论工作领导机构布置每个省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件事的组织工作还是由我来担任。到1960年夏天各省都写出了书稿，用这样大呼隆的办法写出的书，水平当然不高。1960年夏天，在北京召集各书编者开了一次会，对编出的书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对所有这些书，没有一本大家认为是满意的。当然在那段时间里，大家还是做了些研究，酝酿了一些思想。经过这次会议，认为每省写一本不是什么好办法，改为当时六个大区每个大区写一本。这样做成就仍不大。个别大区写出了书，多数大区干了一阵子就放下了。这个时期各地写的书，当时我都保存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由于教学需要，同时由于各省、各大区都没有写出较为满意的书，在1960年年底，党中央决定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了一个编写组进行这个工作，主编这本书的任务还是落在我的身上。这本书不只包括社会主义，而且包括资本主义。我知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很难写，于是决定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册出版。这本书的资本主义部分不到半年就完成了。这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直到现在还在用。它基本上是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古典著作的。这本书有它的优点，比如在把《资本论》三卷的内容用精炼和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方面，我觉得还是成功的，但是它的确没有什么创见。如果说这本书有一点新提法，也只是在后来修改时，写进了这样一个意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则是绝对的，即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相对贫困化的现象，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时期，也都存在相对贫困化的现象；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即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相当大幅度地下降，则是相对的，只是在灾荒、危机、战争等时期才明显地发生。书里讲的这样一个意思，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因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我国和外国都有一些争论，当时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可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原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样说是完全站得住的。但1980年，我到意大利访问时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到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时，他们之中有几位说，在意大利相对贫困化也不是绝对的。他们还举了一些材料说明相对贫困化也是相

对的。我不了解意大利的情况，如果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本书中唯一的一点新提法也就不一定站得住。

虽然我们编写的这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我一直也不重视它。我在这本书上也没有花什么气力。我们花了很大气力去写这本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十来个人搞了四五年。写这个部分时我们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独立的书，不想把它和资本主义部分合成一本书。后来干脆不把它叫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叫作《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比斯大林的那本著作少了“苏联”两个字，也没有加“中国”两个字，以此表达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带有一般性的。这个《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稿本，分成九个分册。这些分册除一两册外都印出来了，但是是作为保密的资料印出来的，没有拿出来见人。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大家感到很不成熟，拿不出手。这本书的写作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作都停下来了，编写组也就散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开始重新酝酿写这本书。1975年7月起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就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在联系学部的工作中，我负责联系它下属的经济研究所。不久以后我又兼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布置经济研究所编写两本经济学辞典。一本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这部辞典是作为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一本书的准备工作而编写的。我考虑如要写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专著，一定要使用这个学科的专用名词。建立一个学科需要有自己的专门术语，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而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专门术语的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使用的术语有些是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借来的，有些是在这样的名词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五个字。这种情况当然很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建立。因此，要先写这部辞典。这部辞典是被当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来写的。这个工作因“批邓”而中断了。还有一部辞典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统计辞典》。这部辞典也是作为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种准备工作来做的，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是有间接的意义。编写这样一部辞典也是在研究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过程中想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概念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它不能直接表现现实。直接反映现实的概念，我称之为统计概念（其中一部分是统计指标），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统计概念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概念区别开来，也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而我不愿意仅仅从消极方面去做这种区分，所以采取对社会主义社会统计概

念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分析方法，通过这种分析来为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制造些砖瓦等建筑材料。这个工作也因“批邓”而中断。

这个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又一次中断的“批邓”，是一个短命的运动。它的失败就是“四人帮”的覆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就重整旗鼓，开始重新动员、重新组织的工作。

先是在1977年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的同时，重新提出开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问题，并且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组织力量，编写了关于按劳分配若干理论概念的书。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前人们提出来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一个一个地复苏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开始酝酿。这也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增加了动力。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对于我国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它通过多渠道对这个学科发生影响。

1979年我重新组织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本书的编写组。编写组制订了工作计划，如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当中的问题等。后来，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研究会的许多活动对编写这本书有很大帮助。在这期间，我将“文化大革命”前后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论文编成《探索》第一卷、第二卷。第一卷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论文和演讲；第二卷是“文化大革命”后到1980年的论文、演讲。第三卷的稿子已经基本编好了。今后这方面的文章就编入第四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整个国家政治上安定，可以不必顾虑这种研究又会中断。第二，国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就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领域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很大促进作用。第三，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的正确与否，就能比较快地受到检验。第四，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强调整个工作纳入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要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营，这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许多要求，也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第五，由于与外国交往发展，我们了解到比较多的国外情况，有比较多的机会与外国学者接触，我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视野就比以前开阔，思想资料更加丰富。

这几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展了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实际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因此总的来说，这几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思想是有相当发展的。

我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思想也有相当的发展。在这六年中，我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方面写成的文章有两卷，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两倍。当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研究我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写的东西和演讲，比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抽象理论问题要多得多，但是我在研究全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中，经常去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问题，这对我的思想有较大的启发，我的许多思想就是从研究现实问题中产生和发展的。

但是当我想到要写一本这个学科的专著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准备工作很不成熟。对有一些问题我的认识比较明确，也还比较丰富，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却没有时间去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坐下来写作，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提出，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同时，对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自己也没有形成什么比较成熟的意见，写书的结构更没有具体地去考虑，原来想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的写作工作，直到现在没有找到合作者，而自己又没有时间和精力，仍然处于没有开始的状况。编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统计辞典》的工作，则有湖北财经学院按我的要求在做。考察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的历史，从1983年已开始，但现在还处在大量收集资料（包括世界各国和我国的资料）的阶段。这个工作的最后目标是写成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马克思主义）史》的书。在这一研究中，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之外，把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作为背景材料也要加以考察。尽管这件事工作量很大，但是对我要写的那部专著来说，它不过是若干方面准备工作中的一个。

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有八年之久，但是在写书这件事情上进展得还不那么理想，因此我打算从1985年开始，用多一点时间放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上。即使这样，我仍然不知道这个工作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这个工作我认为只有按照预定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我计算一下，这个工作的完成恐怕至少要再花七八年工夫，从我现在的年龄来考虑，能否完成，也是一个问题。

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上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我们编书组的同志和很多同志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工作，抓紧完成写作的任务。因此我打算除了抓紧研究历史，

研究现实，研究概念，研究体系，并尽早动手把这本书写出来外，另外再做一点“应急”的工作，先拿一些不成熟的东西出来，欢迎更多的同志来参加这项工作。于是我想做这样几件事情：第一，在这个每两个月一次的经济活动周内，把想到的问题讲一讲。第二，1985年下半年开始，以讲课的方式，系统地讲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完成以后，以参加这本书的同志为基础，组织力量再编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读本》。

今天我们就开始实行这个计划。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

要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明确它的对象。一门科学的对象规定这门科学的质。它规定这门科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问题，也许有人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但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认为自己这几年才把这个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一些。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不全是一回事。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研究，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带一般性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的生产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生产关系”。当然政治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研究在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下怎样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怎样的作用。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的研究，则不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而属于一种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具体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我认为把这门学问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比较合适。人们还有一种提法，把这门科学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个名词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新名词。列宁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